

從電影《再見，南屏晚鐘》看中國語境下的「出櫃」

引言

在討論中國的「同性戀」議題時，「家庭」似乎是無法繞過的問題，只因「家」本就是儒學禮規實踐的核心場域。¹同樣，電影《再見，南屏晚鐘》也將「同性戀」及相關議題置於一個中國家庭之中，講述了在傳統「家庭」觀念制約下兩代人的故事。女主角黃筱莢有一個「支離破碎」的家庭，父親黃濤與母親李久梅關係不和，她從小也與母親矛盾重重，而當某一天，李久梅發現黃濤在外有同性戀人，「家」成為三個人的噩夢。但電影不僅是一個中國社會下被迫進入婚姻的「男同性戀」與「同妻」的故事，隨着電影接近尾聲，觀眾漸漸發現，李久梅的歇斯底里的背後原來另有原因——她從始至終都愛着女人。

電影將黃濤的「逸軌」置於明處，在當時中國的社會環境和思想觀念之下，作為「男同志」的他只能進入婚姻，而他騙婚又婚後偷歡，似乎是家庭破碎的導火索；而李久梅的「同性戀」身份則被置於暗處，她隱藏甚至否定自己的同性情慾，努力維持自己在家庭和社會中「合宜」的位置，她的歇斯底里背後不僅是中國傳統觀念下「同性戀」身份認同的問題，其背後還有整個社會的「含蓄」的制約力。

¹ Judith Stacey. *Patriarchy and Socialist Revolution in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3, 31.

而本文也將分別從黃濤和李久梅兩個角色同性情慾的困境，探討中國語境之下的「出櫃」。

「逸軌」的父親——同性戀污名化、社會和家庭

黃濤被發現與男性情人偷歡後，從未承認過自己是「同性戀」，即便他被數次「捉姦」。而阻礙他「出櫃」的是多種因素的組合：社會對同性戀的污名化、工作單位的行政制裁以及傳統家庭觀念的制約。

黃濤與同性情人偷歡被捉，開啟了電影對於「同性戀」的討論。李久梅跟蹤黃濤並最終「捉姦在床」後，她極其憤怒，沖向黃濤用手提包毆打，用手推搡，對着丈夫哭吼到：「真不要臉！真不要臉！真不要臉！……丟死人啦！真是啊！」發現丈夫出軌男人，憤怒的李久梅連罵了十句「真不要臉！」。同性性行為在此處更多的是一種道德上的墮落，而這也與當時的中國同性戀的社會文化環境有關。電影中的這個場景大致發生在上世紀 90 年代，「同性戀」一詞已經出現在中國媒體中。1980 年《人民日報》在關於西班牙的一篇報道中首次出現「同性戀」一詞，將其報道為一種「性關係混亂」；其後《人民日報》上出現「同性戀」字眼的文章多是與「資產階級」、「色情」、「艾滋病」等相關的負面報道。而 1986 年中國出現首例艾滋病患者後，新聞對「同性戀」的報道更多的和艾滋病相鏈接，而「嚴禁搞同性戀」也被認為是預防艾滋病的首要措施。²在李久梅發現丈夫的

² 李銀河. 新中國性話語研究. 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 2014, 頁 304-325。

「逸軌」後，對女兒黃筱莢說：「你知道嗎，你敬愛的爸爸是個同性戀！」在這裡，「同性戀」成為「敬愛」的反面，是不光彩的，不體面的，丟臉的。除此之外，1989年《中國精神障礙分類與診斷標準》第二版將同性戀歸入「性變態」範疇，也加重了社會對同性戀的污名化。李久梅一直將黃濤的同性情慾稱為是「病」，而即便是十數年後，李久梅在餐桌上與筱莢談論起黃濤的「病」，依舊說：「你算說錯了，你這書都白讀了。這是心理疾病，你懂嗎？」2001年《中國精神障礙分類與診斷標準》第三版就已經將「自我和諧型同性戀」從中刪除，然而近20年過去後，李久梅依舊認為這是心理疾病。

而另一個重要的因素，是黃濤的職業——大學老師。在黃濤被「捉姦」後，李久梅及其娘家人都對黃濤進行了毆打和譴責，但是處於對維繫家庭的考慮，並沒有人報警或者向學校寫舉報信。自1949年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並沒有專門的法律禁止同性戀愛，但1978年男性性行為被納入「流氓罪」，實際上成為針對同性戀群體的法律。但同性戀在法律上的模糊，使得同性戀群體面臨更大的威脅：黨和行政的制裁。中國在1978年實行改革開放之前，是通過「單位」這一社會機制分配所有的工作。而因為沒有針對同性戀的法律，行政單位可以自行決定如何處理有關同性戀的個案；而在沒有刑法的情況下，根據法律判例向法院提出上訴幾乎是不存在的。因此，一次同性性行為的暴露可能會影響一個人的一生。³雖然1978年改革開放之後，城市居民的工作並不是完全由政府分配，但時至今日，公務員、教師、警察等「體制內」的工作，依舊會受到行政制裁。直到1997年「流氓罪」才被廢除，而當時的黃濤同時面臨著來自法律制裁和行政制裁的壓力，

³ Li Yinhe. "Regulating Male Same-sex Relationships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n *Sex and Sexuality in China*, 82-101. Routledge Taylor & Francis Group, 2006.

「出櫃」對他而言幾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除此之外，傳統「家庭」觀念也同樣制約了他——傳統儒家文化對於異性婚姻、生育以及不同性別和代際角色的要求，促使他結婚生子，並在婚姻出現危機時協商和妥協。傳統儒學在本質上是一套家庭生活的禮規，以此為基礎建立社會秩序、道德標準和行為規範；家庭成員則在「男尊女卑」「長尊幼卑」的秩序下，依照自己的性別、代際、年齡獲得相應的權力和地位，並且承擔相應的責任。而以家庭為基礎的父權制雖在 20 世紀遭遇數次改革衝擊，但父權制的基本結構仍保留了下來，且以「孝」為核心的傳統價值觀以及「男尊女卑」「長尊幼卑」的秩序仍主導着中國家庭。⁴在黃濤和李久梅的婚禮上，兩人給雙方父母敬酒時說：「謝謝您們！您們就等着抱孫子吧！」，在這裡，當「謝謝」被道出的同時，也暗含着黃濤和李久梅二人擁有了感謝父母養育之恩的資格，即二人的婚姻以及包含在婚姻之中的生育職責的進行。因此在電影中，進入異性婚姻和生兒育女在二人向父母盡「孝」——這一傳統家庭價值觀念中最重要的部分——的過程中起着基礎性的作用。而與此同時，傳統家庭觀念也生產了「男性氣質」的理想型，要求家庭中的「父親」威嚴，扛起家中的重任，而一位合格的父親是不能「逸軌」的。因此，在黃濤李久梅的婚姻破碎後，黃濤無法向女兒「出櫃」，也無法將「擔子」

⁴ Judith Stacey 和 Martin King Whyte 等學者都已經在各自的研究中闡明，以家庭為基礎的父權制，在人民鬥爭時期以及新中國成立至改革開放前的數次社會主義改革期間，都受到不同程度的衝擊，但從未被根本動搖；直到上世紀 90 年代，中國父權制的基本結構仍被基本保留。蔡玉萍，彭鈞旎在《男性妥協：中國的城鄉遷移、家庭和性別》一書中探討了改革開放後中國父權制結構的變化，認為經濟改革和隨之而來的城鄉人口遷徙，使農村父權制的根基遭到動搖，但以「孝」為主的傳統家庭價值仍在中國社會仍保持重要性；Gonçalo Santos, Andrew Kipnis 和 Elisabeth Engebretsen 等學者也就在各自研究中表明，中國社會雖經歷巨變，傳統「男尊女卑」和「長尊幼卑」的性別和代際等級秩序仍根深蒂固，影響着中國的家庭和社會。Judith Stacey. *Patriarchy and Socialist Revolution in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3; Martin King Whyte. *China's Revolutions and Intergenerational Relations*. Michigan Monographs in Chinese Studies; No. 96. Ann Arbor: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y of Michigan, 2003; Gonçalo D Santos, and Stevan Harrell. *Transforming Patriarchy: Chinese Families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17. 蔡玉萍，彭鈞旎。男性妥協：中國的城鄉遷移、家庭和性別。第 1 版 ed. 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9。

放到女兒的肩上，只能選擇維持婚姻「湊合著過吧」。

「歇斯底里」的母親——身份認同和「含蓄」政治

在電影中，母親李久梅的是「歇斯底里」的、瘋狂的，她發現了丈夫「同性戀」的身份，卻不願意和丈夫離婚，而是選擇維持這破碎的婚姻：她擺「鴻門宴」請丈夫的同性情人及其家人到家裡吃飯，養狗逼丈夫回家，信邪教為丈夫「治病」……而其間她對丈夫，對女兒，乃至對自己的怨恨憤懣，使得這個「家」成為三個人的夢魘。而隨着電影的展開，李久梅「歇斯底里」背後真正的原因被揭曉——她在婚前就與好友劉媛有着曖昧不清的情愫，卻迴避自己的同性情慾，進入「正常」的異性婚姻。她對丈夫「逸軌」行為的「歇斯底里」，其背後是面對自己同性情慾的掙扎和煎熬。

但在電影中，即便李久梅與劉媛相互喜歡，李久梅也並沒有認為自己是「同性戀」，而將其視為一種「錯誤」情感和行為。而之後李久梅決定和黃濤結婚了，劉媛很高興，李久梅對劉媛說：「大家不都得結婚生孩子嗎？這一關遲早都得過，還不如趁着年輕，把事兒辦了算了……我從來沒喜歡過什麼男人，那還真能一輩子不結婚呀？那……那不是有毛病嗎？」在這裡，李久梅認為進入異性婚姻是「理所當然」的，而在其中，她並沒有將性慾、性徵納入是否進入異性婚姻的考量之中，在這裡，婚姻有着先於性徵、性慾的地位。

李久梅並不認為自己是「同性戀」，因為傳統中國文化中只有個體的同性性行為，而沒有「同性戀」這樣一個身份（identity）。⁵學界普遍認為中國有關「自我」的概念與西方不同：西方的「自我」是一種「本質自我」（essential self），關注個人內在的自我意識；而中國是「關係式自我」（relational self），它產生於個人與家庭、社會的關係之中。因此，也不存在一個由個人「性徵」（sexuality）或者「性慾」（sexual desire）來定義的身份。⁶而李久梅對於自己同性情慾和婚姻的態度，也印證了 Lisa Rofel、周華山和江紹祺等學者對於中國同志的「身份」、「性徵」和「家庭」之間的關係的研究：中國社會結構中「家庭-親屬」關係有着優先地位，而個人的「身份」和「性徵」都需要在個人與家庭的關係中產生。⁷正因為如此，李久梅的同性情慾為她理解自己的身份帶來了困擾。

但對於自己身份的困惑何至於令她「歇斯底里」乃至「瘋狂」？在李久梅不同於黃濤的「歇斯底里」背後，我們還應該注意到一種更為「含蓄」和強制的約束力。劉人鵬和丁乃非認為，在華語地區存在着一種「含蓄」政治：在儒學「賦詩言志」的理念下，「含蓄」由一種詩學理想進而成為一種維繫既定秩序的機制，個人的「自律」「守己」不僅是「對內」的問題，更是「對外」如何扮演合宜角色的問題。而在這樣的向心性的「含蓄」政治之下，「秩序就可以用一種不需明說的含

⁵ Bret Hinsch. *Passions of the Cut Sleeve: The Male Homosexual Tradition in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0, 1-14.

⁶ Travis Kong. *Chinese Male Homosexualities: Memba, Tongzhi and Golden Boy*. Routledge Contemporary China Series; 52. Abingdon, Oxon; New York: Routledge, 2011, 199.

⁷ Lisa Rofel 認為，中國社會中的「家庭」是「歸屬（belonging）」的轉喻詞（metonym），「在中國，持續不斷的家庭話語生產是建立人的人性和社會主體性不可缺少的場所」；周華山也強調了在中國社會結構是「家庭-親屬（family-kin）」至上的，個人無法將「性」與「家庭-親屬關係（family-kin relationship）」分離開，因此「中國的同志更傾向於將性納入個人和集體層面的社會關係當中，而非優先考慮人權或同性戀權利」；Lisa Rofel. *Desiring China: Experiments in Neoliberalism, Sexuality, and Public Culture*. *Perverse Modernities*.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7, 100; Zhou, Huashan. *Tongzhi: Politics of Same-sex Eroticism in Chinese Societies*. New York: Haworth Press, 2000, 138;

蓄力道，使得秩序中心之外的個體，喪失生存或活躍的可能」。⁸劉人鵬與丁乃非用「含蓄」政治來揭露中國傳統文化中對同性情慾的「默言寬容」在實際上是一種可能更為「致命」的恐同。回到電影中，李久梅發現黃濤與同性情人馬越偷歡，便將馬越的妻子顧曼和兒子馬曉東叫到了家中，擺下「鴻門宴」等待馬越的到來。而當兩家人在飯桌上吃飯時，李久梅隻字不提黃濤與馬越的情人關係，轉而談論自己與黃濤、馬越與顧曼的夫妻關係，但黃濤與馬越的同性「逸軌」行為在這種不被言說之下更加放大，以至產生「窒息感」——因為不被言說，所以也就沒有可以反抗的空間。而這樣的「窒息感」貫穿整部影片，因為李久梅並沒有因為黃濤「同性戀」身份而指責或懲罰他，而是想盡一切辦法讓他「回歸正常」：無論是擺下兩次「鴻門宴」，還是養狗，亦或是求助邪教。而在這整個過程中，李久梅藉由對丈夫的「默言寬容」所努力維繫的和諧，實際上正是她自己迴避、否定同性情慾也要努力遵循的「合宜的」社會秩序。這種「含蓄」的壓力才是造成她「歇斯底里」的原因。因此，當邪教指責她是因為「前世的業力才感召來這樣的丈夫」時，這種「不含蓄」的指責反而給了李久梅喘息的空間。所以，當得知女兒筱莢向公安局舉報邪教時，李久梅終於抑制不住自己的情緒說到：「這麼多年，你覺得媽媽容易嗎？你知道媽媽心裏有多苦嗎？我要是不學趙老師的法，我真的馬上就要瘋了，你知道嗎？」

「出櫃」在中國語境下的討論

⁸ 劉人鵬, 丁乃非. 含蓄美學與酷兒攻略[J]. 載劉人鵬, 丁乃非, 白瑞梅. 《罔兩問景: 酷兒閱讀攻略》. 中壢: 國立中央大學性/別研究室, 2007.

從電影《再見，南屏晚鐘》里黃濤、李久梅及其同性戀人們的生活和經歷，我們能窺見在中國社會中，無論是幾十年前還是現在，同性戀群體的生活都面臨著諸多挑戰。社會對「同性戀」的污名化雖在漸漸減弱但其影響依舊存在；同性戀在法律上仍處於模糊的地位，而在「體制內」工作的群體仍會受到行政制裁的威脅；儒家思想下的父權制以及傳統的家庭觀念仍保留了下來，家庭在諸多方面仍舊制約著同性戀群體甚至成為其最大的壓力來源；⁹而「家本位」的中國文化和社會又為他們理解自己身份和實踐同性情慾帶來更多更複雜的問題。而如何解決這些困境，是眾多學者們研究的焦點，而「出櫃」一直是爭論點。

美國式以「出櫃」作為主要模式的身份政治（identity politics），有其自己的歷史脈絡，它產生於美國 1960 年代的人權運動，其基礎是個人主義的發展以及對自我的重視。特別在 1969 年美國「石牆暴動」（Stonewall riots）之後，性少數群體通過公開自己的性取向以對抗來自異性戀主流社會的壓迫，開啟了所謂的「出櫃時代」（come out era）。¹⁰但這種美國的「出櫃模式」多大程度上在中國適用，有着許多爭議。周華山認為中國社會本就不存在「同性戀-異性戀」二元對立，也缺乏恐同的傳統，因此無法維持這種「對抗性的政治」，因此反對「出櫃」而看重中國社會中個人在家庭與同性情慾實踐間的「迂迴策略」；而劉人鵬和丁乃非則對周華山的論述進行了批判，認為中國社會的對「同性戀」的「默言寬容」本就是一種「溫和」的恐同，將「傳統中國文化」本質化為超驗性的存在，繼續默守其中的傳統秩序，就會忽略這秩序本身即是壓迫的來源。那中國的同志群體要不要出櫃？中國的同志運動要如何發展？

⁹ Li Yinhe. "Regulating Male Same-sex Relationships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n *Sex and Sexuality in China*, 82-101. Routledge Taylor & Francis Group, 2006.

¹⁰ Amin Ghaziani. Post-gay collective identity construction. *Social Problems* 58.1 (2011): 99-125.

Francis Fukuyama 對於美國自上世紀下半葉興起的身份政治運動進行了反思，他認為身份政治的確使各種少數群體的不公待遇被關注，也促使社會和文化的進步；但與此同時，過分關注每一個單獨的小群體，卻可能忽略作為「公民」這樣一個更大群體層面的問題。「社會需要保護邊緣的、被排斥的群體，但也需要通過審議和達成共識的方式實現共同目標。左、右翼政治議程轉向對狹小的群體身份的保護，最終將威脅到這一協商過程。補救的辦法並非放棄身份的觀念……而是規定出更大、更具整合性（integrative）的國家身份，它需要把自由民主社會確實具有的多樣性考慮在內。」¹¹藉由 Fukuyama 的觀點，中國的同志群體有其困境，也需要被關注，但同時，即便在同志群體中也依然存在階級、性別、族裔等諸多問題，僅僅關注「出櫃」或許無法找到真正解決同志問題的方案。誠然中國的政治和文化有其特殊性，但能否有這個可能，在中國語境下規定出多樣性的、保持開放的、更大的身份，以尋求更大的平等？

參考文獻

Fukuyama, Francis. *Against identity politics: The new tribalism and the crisis of democracy*. *Foreign Aff.* 97 (2018): 90.

Ghaziani, Amin. *Post-gay collective identity construction*. *Social Problems* 58.1 (2011): 99-125.

Hirsch, Bret. *Passions of the Cut Sleeve : The Male Homosexual Tradition in China*.

¹¹ Fukuyama, Francis. "Against identity politics: The new tribalism and the crisis of democracy." *Foreign Aff.* 97 (2018): 90.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0.

Kong, Travis. *Chinese Male Homosexualities : Memba, Tongzhi and Golden Boy*. Routledge Contemporary China Series ; 52. Abingdon, Oxon ; New York: Routledge, 2011.

Rofel, Lisa. *Desiring China : Experiments in Neoliberalism, Sexuality, and Public Culture*. Perverse Modernities.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7.

Santos, Gonçalo D., and Stevan Harrell. *Transforming Patriarchy : Chinese Families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17.

Stacey, Judith. *Patriarchy and Socialist Revolution in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3.

Whyte, Martin King. *China's Revolutions and Intergenerational Relations*. Michigan Monographs in Chinese Studies ; No. 96. Ann Arbor: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y of Michigan, 2003.

Yinhe, Li. "Regulating Male Same-sex Relationships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n *Sex and Sexuality in China*, 82-101. Routledge Taylor & Francis Group, 2006.

Zhou, Huashan. *Tongzhi : Politics of Same-sex Eroticism in Chinese Societies*. New York: Haworth Press, 2000.

蔡玉萍, 彭鈞旒. *男性妥協 : 中國的城鄉遷移、家庭和性別*. 第1版 ed. 北京: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2019.

李銀河. *新中國性話語研究*. 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 2014.

劉人鵬, 丁乃非. 含蓄美學與酷兒政略[J]. 載劉人鵬, 丁乃非, 白瑞梅. 《罔兩問景: 酷兒閱讀攻略》. 中壢: 國立中央大學性/別研究室, 2007.